

“古稀猶為家國計”： 抗戰時期蔣維喬的日常生活*

邱宏霆

[提 要]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蟄居上海的蔣維喬經多年潛心研修，已在融合儒釋道文化精髓及現代醫學知識的靜坐修法方面小有所成。加之他日常注重鍛煉體魄、講求醫療保健，因此雖年逾古稀，仍精神矍鑠，身兼教職以維持家計。日本全面侵華後，因目睹滬上文教事業遭受重創，本不願再與聞政事的蔣維喬毅然接管正風文學院、誠正文學院及鴻英圖書館，為籌措辦學經費和建館資金多方奔走，同時參與愛國女校、常州旅滬同鄉會及“影印宋版藏經會”的高層決策，憑藉其豐富的組織與協調經驗，充分發揮各團體的優勢，推動學校、圖書館及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助合作與共贏。在動盪不安的淪陷區環境中，蔣維喬始終從容自若、平和淡然，其生活樣態與當時部分青年陷於迷茫頹喪、及時行樂的風氣形成鮮明對比。他於國家危亡之際，堅守踐行“教育救國”理念，為保全和延續淪陷區文教事業做出卓越貢獻，堪稱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勇擔使命、報效國家的典範。

[關鍵詞] 抗戰 蔣維喬 教育救國 淪陷區文教事業

[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229 - 10

近年來，國內外學界日益重視日常生活史研究，強調從社會大眾千姿百態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探究其變化發生機制，從而深入理解歷史變遷對個體生活的影響，以及個體如何在歷史進程中塑造自己的生活。這一研究視角“對所有社會階層人的生活，包括他們的‘私人領域’都感興趣，不僅是想要瞭解誰、什麼對歷史起了作用，而且還想知道歷史是如何對人施加影響的，以及他是如何接受它的。”^①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變革時代，抗日戰爭不僅牽涉政治格局的重塑、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國際地位的轉變，更深刻觸及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激發了民族覺醒。當前，學界對淪陷區、國統區及根據地民眾的生活狀況已有不同程度的探討，多聚焦於政要、婦女、商人、學生、農民等群體；相對而言，關於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系統研究，仍有進一步拓展與深化的空間。

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別號因是子，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與佛學家，曾任南京臨時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近代中日商約與雙邊經貿關係研究(1871-1931)”(項目號：20CZS055)、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 72 批面上資助(項目號：2022M721121)階段性研究成果。

政府教育部秘書長、教育部參事、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校長等職，主持制訂《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大中小學學制方案》等規章制度，並編輯多部中小學教科書。其論著廣泛涵蓋哲學、教育、佛學與養生等領域，為構建中國哲學史編撰體例、普及佛教知識、推動近代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顯著貢獻。抗戰期間，蔣維喬蟄居上海，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與正風文學院（1940年更名為誠明文學院），同時擔任多校行政職務及鴻英圖書館館長。其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養生修法及社會交際細節，均詳實記錄於個人日記中，為觀察上海淪陷區的文化事業實態提供了珍貴窗口。既往有關蔣維喬的研究，多集中於其戰前的文化思想、教育改革、日常生活與修身實踐，對其戰時生活狀況的關注則相對不足。^②有鑒於此，本文主要依據蔣維喬所撰日記，通過考察其健康習慣、教育活動及社會參與，從知識分子視角體察戰時上海文教事業在艱難環境中維持與發展的實況，並試圖揭示抗戰時期不同階層與個體之間迥然相異的處世心境和生活樣態。

一、養生有道：蔣維喬的健康習慣

蔣維喬自幼體弱多病，消瘦骨立，常頭暈目眩、耳鳴盜汗，十五六歲後又添怔忡心悸、潮熱等症，加之刻苦讀書以致深夜不寐，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以病為常事，以不病為變例”^③。雖以湯藥治療，卻時有懈怠。及至二十八歲染上肺結核，咳嗽咯血，久治不愈，因恐重蹈其兄肺病去世之覆轍，方開始重視養生，規律作息、均衡飲食、鍛煉身心，並自此長期保持良好習慣，至花甲之年仍未改變。

（一）飲食作息

因常年修習靜坐，蔣維喬的飲食與作息習慣亦相應調整。飲食方面，他二十二歲時因進食過快、不加節制且時間不規律，以致患上胃擴張病。後通過研習靜坐法與衛生學，逐漸認識到宜少食、定時、細嚼慢嚥，否則易導致消化不良或胃液分泌過多，引發疾病。於是他大幅減少食量，“每餐所食之物已較前減少三分之二”^④，並極力避免油膩重口之物，“能素食為最佳”^⑤。他還提倡不吃早餐，實行“二食主義”，即正午12點進午餐，晚7至8點進晚餐，以維繫“身心健康及不老長壽”^⑥。靜坐時間則選在早晨空腹及餐後兩小時，以免影響消化。

睡眠方面，因靜坐需神智清明，而睡眠過多或過少皆影響心神，故蔣維喬以每日睡眠八小時為宜。他自年輕時便養成嚴格作息，凌晨三四點起床，於床上趺坐一至兩小時。至抗戰時期，因年齡、體力與時局等因素，起床時間推遲至五六點，之後修法誦經；晚間九點沐浴、十點就寢，數十年如一日。關於睡眠與靜坐的時間安排，他主張因人而異：半夜醒後起坐固然好，若覺睡眠不足亦可小憩，功力深厚者甚至可以坐代睡，但“此非可以勉強學步”^⑦。

（二）調養身心

蔣維喬主張身心兼修，既重視精神修養，亦不荒廢體魄鍛煉。在調神養心方面，他融合儒釋道傳統養生學說，並結合哲學、心理學、生理學、衛生學等現代科學，提出一套靜坐養生體系，通過調息靜心以強身健體。自二十八歲起，他每日晨起與睡前各靜坐一小時，即便出行在外亦不間斷。在修行方法上，他博覽道經佛典，參加道場法會，求教於宗教人士，多次調整修持方式：1917年由道家功夫改習佛教禪修，1929年受大愚法師點撥，修習《菩提心成就契》、《如來母契》、《如來語契》、《如來善集陀羅尼契》等。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感傷於國土淪喪、民不聊生，他修法後加誦《金光明頂經》、《仁王護國經》、《阿彌陀經》、《往生咒》等，“為國家人民祈禱和平，解除痛苦”^⑧。1933年經諾那呼圖克圖傳授大彌陀法及長壽法，1937年於毗盧寺行灌頂禮，“上師教令誦亥母金剛咒”^⑨。由是每日晨起靜坐、修法、誦經、持咒長達三四小時，成為抗戰期間其祛病養生的主要方式。

在以佛法修煉的同時，蔣維喬亦兼修道家功夫，常讀老莊經典，並以《易經》卜卦為樂。1936 至 1939 年間，他與道家人士蕭步（布）禪過從甚密，幾乎每日對坐，得其傳授“守中之法”，遂將修法由“守丹田”改為“守中宮”，其後遂有諸如“動力恒自中宮升頭部，眉間現紫金光，時時衝動印堂，似欲開天眼出竅”^⑩、“入坐上半身放光，即現空相，……下半亦放白光，如在白雲中，而全身現空相”等奇異體驗^⑪。蕭氏亦不時給予修行和用藥指導，如“丹田充實，已結丹”^⑫、“三田合一功夫上變化，夜間不寐，乃陽盡陰純，缺少真鉛之故”等^⑬，故蔣維喬尊其為師，二人交往直至 1939 年 5 月蕭氏返津方漸疏。此外，他還與道教領袖人物陳撝寧探討“靈泉神水”之性質^⑭，盛讚其“於道家經典研究極深，功夫亦到家，並世不可得之人也”^⑮。

在強健體魄方面，蔣維喬喜好戶外散步，每日至草坪、江邊或公園呼吸新鮮空氣，並習太極拳、推手及劍術一至二小時。春秋時節，常邀集朋友尋幽探勝。全面抗戰爆發前，他曾遊歷陝西、浙江、江西、山東等地。每至一處，必先閱讀方志遊記以瞭解風土人文。遊覽時“腰腳既健，每入名山，必登絕頂，日行數十里，少壯者不能從”。年過六旬登華山時仍能從容越過鑿於懸崖上的險道“鷄子翻身”，抵達三面絕壁之旗亭，“行若無事”。^⑯登山之餘，亦常訪名寺古剎、考察農事產業，撰有《雪竇遊記》、《華山遊記》、《馬跡山遊記》、《嶗山遊記》等多篇遊記。上海淪陷後，出遊中斷，仍以習拳舞劍鍛煉身體。

（三）醫療保健

蔣維喬雖重靜坐修法，卻不諱疾忌醫。因自幼多病，他格外重視醫療保健，青年時修習衛生學、植物學等課程，成績優良，故具有較豐富的醫療衛生知識與先進觀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具備較強的衛生防病意識。抗戰期間社會秩序混亂，民眾多忽視衛生，傳染病因之盛行。在此情形下，蔣維喬仍堅持每日就寢前沐浴，並戒除隨地吐痰之習：“在道上不吐，行之兩日尚未再犯。可見惡習愈小亦愈難除。”^⑰疾病預防方面，1932 年遊華山前，因聞洛陽、西安有時疫，遂兩度至醫生處接種防疫針。^⑱日常亦注意監測血壓，“余之血壓，最低 101 度，最高 140 度，確合健康標準”^⑲，並定期體檢，“心肺亦毫無障礙，肺之兩尖特別長，蓋因余之功夫所致，體溫亦良”^⑳。他還購置補血針、鈣藥針、維生素、肝精、鐵質等針劑，定期至學校醫務處或診所注射。這種良好的衛生防病意識，雖有助於防病及維護公共衛生，但為尋求營養補充、改善機能而過度使用保健藥物亦存在風險，如 20 世紀二三十年風靡一時的西藥補血針（又名清血針），中醫壽守型曾撰文批評西醫貪圖其利豐厚而存在濫用問題^㉑，報端亦有過量致死案例。蔣維喬曾連續兩年幾乎每日注射，又因咳嗽嘗試鈣藥針^㉒，雖出於保健目的，卻亦暴露於藥物風險之中。

其二，中西匯通的醫療觀念與積極接受新療法。X 光自晚清傳入中國後，廣泛應用於骨科、肺病、皮膚病等診療方面。1931 年，蔣維喬因傷風久咳不愈，試驗多種中、西藥皆不能根治，遂聽西醫丁福保勸說，至肺病療養院照射 X 光以排除肺癆：“樓上一室安置機器，其旁先用電爐燒熱，我即立入機器之前方，胸前則置幹片，裸我上體，光從背部射入，為時不過一秒鐘而已”^㉓。言語中透出好奇與探究。經查明為慢性支氣管炎後，轉請中醫王仲奇開方調理。後又多次借 X 光治療牙痛與頸部皮癬，頗以為常。此外，他還大膽嘗試痔瘡療法。或受靜坐影響，其痔瘡頑固，兩次手術仍未愈。1938 年經人介紹至蔡漢基醫師處，通過敷藥提出痔核，雖療程持續多日且“作痛殊甚”^㉔，但終祛病根，故盛讚“此秘藥不損好肉，能使壞痔與之脫離，真神妙也”^㉕。次年復發仍用該法，“不若去年之痛耳”^㉖，顯現出開放積極的治療心態與樂觀主動的風險承受意識。

總體而言，憑藉科學的衛生知識、動靜結合的生活習慣和開放積極的醫療觀念，加之社會地位、

人脈資源與生活條件的支持，蔣維喬雖偶有病痛，但體魄較同齡人更見強健，從而為其在抗戰時期維護與推進上海教育文化事業提供了重要基礎。

二、興學育才：蔣維喬的教育活動

清末民初社會局勢風譎雲詭，蔣維喬認為“救國根本，厥在教育”^{②7}。他自1903年擔任愛國學社國文教員，至1927年卸任東南大學校長，推進了中國近代教育的革新。就在其息影滬上、不願再聞世事之際，一生積蓄養老費萬數千金，為人矇騙，無以為生，“以生活環境突變，不得不重操教讀生涯。”^{②8}於是1929年始，他先後任光華大學文學院教授、誠明文學院教授兼院長、太炎文學院教授、上海愛國女校校長等職務，在艱苦的戰爭條件下依然恪盡職守、堅持辦學、籌措經費，為戰時教育的維繫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家庭教育

作為一位身體力行的教育者，蔣維喬對孫輩悉心教養，注重生活與學習習慣的養成以及興趣愛好的全面發展。在生活層面，他積極引導孫輩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定期去公園呼吸新鮮空氣、修習太極拳，並為之報班學習游泳、騎術等，將養生理念融入日常實踐。此外，蔣維喬亦重視休閒活動的教育意義，常攜孫輩觀賞如《義勇血戰》、《獸國記》、《逃亡》、《紅羊豪俠傳》、《大家庭》、《小將軍》、《紅馬俠》、《小玲瓏》、《全國運動會》、《泰山奪寶》等影片以及雜技、馬戲等表演；並帶領他們參觀各類展覽，如芝加哥博覽籌備會、書畫展覽會、中國參加倫敦藝術預展會、防空防毒展覽會等。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安排孫輩到印刷廠排字間參觀“排字、鑄字、澆紙板等工作”^{②9}，或“至新聞報館看印刷機器”^{③0}，使其親歷排字、鑄字、澆紙板及印刷流程，在情境中拓寬視野、增長見聞，實現寓教於樂。在學習方面，蔣維喬尤為重視閱讀習慣的培養，特為孫輩訂購《幼童文庫》等商務印書館出版物，並每日親筆書寫習字本、輔導功課。他還延聘家庭教師進行針對性教學，例如請傅統先每週三次為孫兒補習英文與算學，自己則審閱其《心理學原理》譯稿作為交換。^{③1}隨著孫輩年齡增長，蔣維喬更在家中講授《文字蒙求》，並批閱其習字作業。淞滬會戰期間，儘管上海教育環境深受衝擊，他仍堅持將孫兒送至光華附中臨時校舍就讀，並在其小考不及格後主動請托教員協助補習英文與算學。^{③2}凡此種種，皆體現出蔣維喬對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視。

（二）日常教學

蔣維喬之子雖已成家，卻終日遊手好閒、不務生計，致使他年近古稀仍須為維持家庭生計而奔波。^{③3}自1929年至1937年“八·一三事變”前，他受聘於上海著名的私立光華大學，同期在滬江大學、正風文學院及暨南文學院兼職，多校並行開設佛教學、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與應用文等課程。其教學任務繁重，日程極為緊湊：通常上午在光華授課兩小時，下午則轉赴滬江或暨南繼續授課兩小時。以1932年5月為例，該月他僅有5天未到校，且在家中為汪仲長等人講授《周易》與《雜卦傳》等內容，“未嘗一日休息”^{③4}。儘管蔣維喬長期鑽研哲學並出版多部專著，卻仍一絲不苟地堅持提前備課、撰寫講義。《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便是其在光華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期間，隨講隨編而成。從監考、閱卷到審閱畢業論文，他皆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在教學態度上，他嚴謹負責，鼓勵學生自主探究。例如，對楊寬、沈延國二人有意搜集諸家對《呂氏春秋》的注釋並編纂集解之舉，他深表贊同，允諾合作。^{③5}同時嚴格要求，實行末位淘汰制，曾因“國文、英文不及格，又不及格學分過半數以上，無故不大考亦不請假”等原因一次開除四十名學生。^{③6}針對“九·一八事變”後光華大學學生頻繁因抗日救國活動而停課的現象，蔣維喬頗不認同，認為滬江大學學生雖亦參與救

國工作，卻能維持正常教學秩序，兩校校風高下可見。^③他亦曾贊許滬江大學在罷課風潮中迅速復課之舉。^④然而，隨著日本侵華態勢加劇，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所引發的惡果日益顯現，蔣維喬開始密切關注學生動向。當他得知軍警將愛國學生圍困一晝夜且禁止送食時，憤然質問：“對外則奉送土地，對內則極端嚴厲，國亡無日，民氣銷沉，誰之過歟？”^⑤

在“孤島”時期的上海，各高等院校或內遷、或停辦、或留守。光華大學、暨南大學、滬江大學、正風文學院等先後遷入租界，維持辦學。這一時期蔣維喬因路遠已辭去暨南文學院教職，而在光華大學任中國語文學系主任，負責確定該系應開學程，聘請龍榆生、蘇濟瀛、陳詒先等來校任教，及預定教材等事務，自己依然主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修詞學等課程，兼在光華附中教授初一年級國文，如是每週任課多達 19 小時，“精力實不勝”^⑥，遂將課程分與他人。1938 年 8 月，蔣維喬接任正風文學院院長後，又在該校及太炎學院開設中國哲學史，終是體力不支、神經衰弱，將光華學生與正風學生合併上課，“以便講者節省精神”^⑦。在學生管理方面，按照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以及教育部頒發的《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與《關於各校實施導師制應注意各點令》，光華大學制訂《導師規程》，要求導師名下學生數量平均以 20 人為限，“隨時指導並考察學生之操行思想及學業，以誘掖獎勸為主旨，重在浹洽情感並指示生活之改進及處世持躬一切方法。”^⑧且規定導師每兩週分別召集學生談話一次或隨時個別談話。然則在嚴峻的戰時條件下，受師資銳減、學生增多等因素影響，師生交流很難如期進行。蔣維喬雖參與了《導師制實施規程》的起草、修改和實施過程，本人分得 19 名學生，以之身兼多校教職、工作繁忙的情況，召集學生次數也不過寥寥，但若學生遭遇疑難，他仍會竭盡所能解其之所困，譬如有學生甘和珍選修《周易》，病假歸來後“從半途談起，不能瞭解”^⑨，蔣維喬遂接連兩三日為其補講功課；1940 年太炎文學院停辦，他幫學生轉學到由正風文學院更名的誠明文學院，王瑜孫為此甚表感激：“有機會接觸到耿淡如、傅統先這些名教授，學到了西洋哲學以及邏輯學、心理學等以前從未碰過的東西，幫我打開了思想之窗”^⑩，彰顯出抗戰時期師生在體制規範外，於共克時艱、堅持學習的環境中形成的深厚情感。

隨著 1941 年 12 月日本佔領上海公共租界，誠明文學院經教職員開會“議決校務暫時停頓”^⑪；光華大學為免遭日偽控制、嚴守愛國立場，對外宣稱停辦，實則改組為誠正文學社、格致理商學社和壬午補習社，維持學校命脈。蔣維喬作為誠正文學社主任，主持校務會議、聘請教師、安排課程等行政事務居多，課程依舊以文學史、佛教史、歷代詩文選為主，惟課時減去一半。1942 年 9 月始，他兼在上海工業專科學校教國文和文藝思潮史，於家中組織靜坐學社，傳習靜坐法，私下又為錢琳叔、江上達、唐純、宋雪琴、吳雲倬等十數人講授《心經》、《金剛經》、《詩經》、《八識規矩》、《百法明門》、《圓覺經》，形式頗類私塾。這種境況一直維持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光華大學和誠明學院相繼復校，方有所轉變。

抗戰時期蔣維喬身兼多校教職的經歷，折射出上海教職員工薪資待遇的低下。光華大學常年辦學經費短缺，不斷降低教員工資，1933 年便遭遇經濟困難，給教員“計鐘點給薪，每年按九個月”。^⑫1937 年為解決大學開學問題，量入為出，復將“教薪約打對折，職薪亦打折”。^⑬儘管 1938 年後光華教職員待遇有所增加，然以副教授陳醒庵每月 192 元作比^⑭，和教育部規定的 320 元最低標準仍有較大差距，加之留守師資數量少，且抗戰後期物價飛漲，“米價前日曾高至每擔六萬元，今日稍跌，至四萬五千元，恐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一浴之價竟至二千一百元，亦駭人聽聞。”^⑮在維持生計的現實驅動下，不單蔣維喬，乃至上海教育界的大學教員都普遍存在兼課現象。而對於蔣維喬這

一境況，學生亦不禁同情：“蔣老真是個老好人，為贍養一家，甘心做牛做馬。”⁵⁰

（三）學校管理

蔣維喬對戰時教育的支持尚不僅限於家庭教育和日常教學，作為多所學校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在參與校務決策、對接政府機關、解決學校發展困境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愛國女校與蔣維喬有著深厚淵源。該校於 1902 年由蔡元培、林少泉、吳產復、陳夢坡等人發起創辦，旨在提高女性知識水平和愛國意識。1903 年蔣維喬受蔡元培之邀，擔任該校義務教員，值該校受債主逼迫、“勢將停閉”之際，“不得已自任校長，籌募款項，恢復舊觀。”⁵¹並找人訂約建屋，使原本遷徙不定的校址得以穩固。時至抗戰時期，蔣維喬早已卸任校長之職，仍保留校董身份，參與一般性行政事務之餘，主要協調解決該校人事和債務糾紛。1932 年“一·二八事變”後，愛國女校戰區內校舍全被焚毀，“三十年來之文物，損失殆盡”⁵²，給本不富裕的學校財政雪上加霜。校長孫翔仲重建校舍、添置設備之餘，在教職員工降薪問題上卻未做好安撫工作，“非但不記前功，反用圓滑手段，挖苦備至”，“喜笑怒罵，更使難堪”⁵³，致使戰時親率學生避難、帶病工作的女教員黃汕自殺未遂，輿論譁然，“區黨部興風作浪，利用機會，想將此校收歸市有”⁵⁴。對此，蔣維喬與季毅生、孫翔仲相談辦法，應教職工代表要求以常務校董資格發布通告，並參與常務校董會決議，推舉季毅生為校長。然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鴻記營造廠以愛國女校拖欠建築費兩萬餘元，把蔣維喬、蔡元培兩位校長保證人訴諸法庭。為救危局，蔣維喬一面協助校方向中央黨部遞交補助申請，得到資金 2 萬元，一面與廠商潘守仁交涉，最終雙方議定 15,000 元，即校方支付現款 5,000 元，蔣維喬支付兩張期票共 10,000 元，“此外一萬零五百餘元潘守仁以校董名義捐助愛校”⁵⁵，方結束糾紛。

辦學經費之短缺，是戰時上海高校的普遍問題，光華大學、正風文學院、太炎學院等面臨著同樣的窘況。1938 年 8 月，蔣維喬應邀擔任旦華學院代理院長、正風文學院院長。相比於新成立的旦華學院，1928 年創辦的正風文學院屢遭日本轟炸，校舍受損嚴重，可謂慘淡經營。蔣維喬鑒於前校長王西神承諾正風債務與後任無涉，遂聲明“正風財產亦絲毫不接收”⁵⁶，並與旦華學院協商，暫以正風借用旦華校舍、二校合作的形式繼續辦學。隨後，他大力整頓校務、編制學制，聘請胡僕安、姚明輝、呂思勉、李仲乾等名家學者授課，使正風文學院一掃積弊，全院“一致埋頭努力，研究學術之風氣充溢一時”⁵⁷，學生數量有所增加。以此蓬勃勢頭為基礎，蔣維喬積極擴充經費來源，不僅向教育部呈請臨時補助，還爭取到更多的出資者，“鄭允與朱錫璿二人分擔正風文學院經費”⁵⁸。他不願強迫他人，“惟校董自願幫助者極所歡迎”⁵⁹，寧借自己七十大壽為學校籌集資金。“蓋余明年七秩生年，最厭祝壽，自三十至六十從未酬觴，明年則親友之來慫恿者殆不能免，故不如借此……籌集基金。”⁶⁰經過蔣維喬的不懈努力，正風文學院不僅很快另租校舍、獨立辦學，還設置了學業獎學金、開辦中學教員選習班，博得各界好評。1940 年該院因屢被日偽騷擾，遂請示教育部批准改作“誠明學院”，在次年日本佔領公共租界後即宣告停辦，實則“隱藏在蘇州工業專業學校上課。敵偽兩方，都沒有注意”⁶¹，得以安全低調地繼續運營。

戰火蔓延，不僅嚴重影響施教方的辦學，更使受教者的求學之路變得分外艱難，戰區大量學生喪失家產，“吃飯穿衣，都沒有保障”⁶²。國民政府於 1938 年開始實施貸學金制度，各省區也不同程度地設有獎學金，但伴隨著抗戰後期貨幣貶值與物價飛漲，學生仍然難以自給。蔣維喬自 1944 年起依託誠明學院、愛國女校和鴻英圖書館，廣泛接洽社會團體，成立獎助學金以紓學生之困。在常州旅滬同鄉會，他身兼教育小組委員、常務理事，起草貸學金簡章和實施方法，籌募貸學金和常州貧兒院教養費，親自往訪募捐隊各隊長，“每至一處，談及貸學金募捐事，皆相當贊成”⁶³，並主持申請

者在誠明學院的招錄選拔工作，“對錄取貸學金之學生訓話”^④。此外，蔣維喬與何德奎、黃仲蘇、唐企林等人合作設立保謙公紀念獎學金，又將鴻英圖書館出借誠正文學院召開助學金委員會，每日輾轉奔波各處之餘，還要酬謝人情，“為酬誠正捐助貸金者補寫對聯”^⑤。在其穿針引線下，社會各界出於對教育的支持紛紛慷慨解囊：“同鄉會開茶話會，為救助隱貧疏散及貸學金募款，當場認捐二千餘萬元”^⑥。“往訪倪君不畏，請渠捐助誠正經費一百萬元，慨然應允。”^⑦一定程度上給大、中、小學生解決了生活和學習上的難題，為培養抗戰人才提供了可能。

三、仁心義行：蔣維喬的社會參與

蔣維喬性格剛直，不慕榮利，“率性而行，不好隨俗，視富貴得喪，漠如也”^⑧，惟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日常交際多集中在文化界人士。抗戰時期，除業已述及的教育領域外，其社會參與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整理典籍以弘揚佛教文化

蔣維喬以佛法調養身心，進而逐步深入佛學研究。平素修法誦經、登山拜寺、講授佛學之餘，與宗教界人士過從甚密，參與整理並出版了多部佛教典籍。《磧砂藏》係佛教經典彙編，歷經宋、元兩代雕版刻印而成，共收錄典籍 1,532 部、6,362 卷，具有極高的歷史與學術價值，“以如此鉅大奇珍，久經名震東亞，覬覦片紙，價已難酬。”^⑨1931 年，為保護西安臥龍寺與開元寺所存孤本，監察委員朱慶瀾聯合葉恭綽等社會名流成立“影印宋版藏經會”，蔣維喬亦列名其中。該書編纂期間，副理事長葉恭綽多次致信蔣維喬，請教版本問題：“宋藏共有數本，此次擬印者究為何本，似須考訂明白。”“磧砂有無由宋逮元之說？”^⑩在安排藏經調查等具體事務上，二人亦頻繁商討，足見蔣維喬“理事”之銜絕非虛名。全書影印工作最終於 1935 年完成。

類似的文獻整理還包括《華嚴疏鈔》的校訂。該書原為唐代澄觀所撰，因歷代傳刻訛誤甚多，1939 年，蔣維喬與應慈法師、范古農等組建《華嚴疏鈔》編印會，彙集中、日各類版本十餘種，考訂異同，補正缺失。作為副理事長，蔣維喬在考校版本、制定凡例、聯繫出版等方面投入大量心血。而戰時最關鍵也最困難者，莫過於經費籌措。蔣維喬帶病奔走，爭取北京刻經處撥款，以及姬覺彌（倉聖明智大學校長）、羅迦陵（哈同夫人）、朱紫橋、葉恭綽、周梅泉等人資助，三年僅得三萬餘元。然該書“排工及製紙型計四千餘頁，亦須四萬元”，加之紙張昂貴，“不敢言印”^⑪。故雖 1941 年即已完成編輯，卻直至 1942 年底籌得十萬元印資^⑫，才籌備印刷，最終於 1944 年春付梓。此外，1943 年蔣維喬還參與盛幼盒等人發起成立的“普慧大藏經”刊行會，負責校勘審定、接洽印刷等事務。

在生存安全受威脅的環境下，蔣維喬不辭艱難推動佛教典籍整理出版，為後世研究佛教義理提供了更全面、準確的文獻資料，促進了佛教文化的傳承與弘揚。

（二）出任要職以維繫公共事業

鴻英圖書館前身為黃炎培、沈恩孚所創“人文圖書館”。1933 年，因實業家葉鴻英捐資 40 萬元以興建館舍、添置設備，遂更名為鴻英圖書館以示紀念，館務仍由沈恩孚主持。蔣維喬與鴻英圖書館的往來大致可追溯至 1934 年 1 月，彼時他受光華大學國學教授莊翔聲等委託，就購地事宜接洽上海市地方協會。後為遴選教材，曾請該館主任嚴名揚“代為審閱近出之修詞學、文學批評史各書”^⑬，但交集不多。至 1941 年，因沈恩孚年邁多病，黃炎培力邀蔣維喬幫同料理，“即代任之駐館董事職權。”^⑭蔣維喬遂削減光華大學課時，列席鴻英圖書館董事會，並於次年正式接任館長職務。

上任後，他首先調解沈恩孚與嚴名揚之間的人事衝突，“彼輩中風狂走，非斷送會館不止。”^⑮對

沈動用律師、偵探、流氓等手段逼迫嚴交印交鑰之舉，予以“正言厲色”之勸誡。^⑥面對日本的文化高壓，他亦沉著應對、積極施救。1942年1月，有日本憲兵及法租界警察二十餘人到館搜查，時任名譽會長的蔣維喬冒雨趕赴交涉，得知係檢查“有無抗日書籍，各書店均去過，不過持此類書籍取去耳”^⑦。此次日方掠去圖書雜誌約三千冊，所幸嚴名揚已事先將書籍目錄割走，才使珍貴線裝書免遭損失。然日人的騷擾活動並未停止。不久後又以圖書館前職員孟徵祥犯有嫌疑，到館拘捕楊中一、陳寶洪等人，“打傷以後，醫治幾個月方愈。”^⑧館中書物亦遭踐踏，狼藉滿地。蔣維喬立即托人設法營救，事後慰問安撫。1945年日本憲兵查抄張鼎元寄存於鴻英圖書館之鐵箱，亦由蔣維喬出面辨明，使全館人員免遭無妄之災。

抗戰後期，鴻英圖書館經費匱乏，難以為繼。1943年沈恩孚八十壽辰，因其不喜祝壽，且心力盡傾注於鴻英圖書館，眾人遂提議“曷不以先生之志為志，藉南極之輝光，增百城之聲價，移嘉賓之觴酒，助後學之津梁，以此多儀藉充館費，俾館事賴以維持”^⑨。蔣維喬被公推為祝壽籌備會主席，撰寫壽文、安排會務、廣邀賓客，壽宴當日“座為之滿”，現場購沈氏“所寫對聯、扇頁”者甚眾^⑩，獻壽儀者更達近四百人。會後，他又籌辦鴻英金石書畫展覽會，在親自書寫屏聯之餘，徵集繆谷瑛、葉恭綽、夏敬觀等200餘位名家作品，展售募款。此外，還與江上達主持成立鴻英圖書館協會，會員每月各捐三千元，以一年為期，“為館中籌經費”^⑪。彼時社會公共事業維持之艱難，誠可想見。

（三）抵拒日偽以堅守民族大義

蔣維喬雖不願與聞政事，卻十分關注抗戰局勢，日記中常記述日本侵略行徑，偶爾亦抒發對國民政府的不滿，“瀏河並未克復，政府亦未派援軍……政府之居心如此，人民由失望而絕望矣。”^⑫閒暇時，他撰寫禱文祈願消災，攜兒孫察看“一二·八”戰跡、先施公司廢墟等進行愛國教育，並勸誡身邊投敵失節者迷途知返。舊識池宗墨投靠殷汝耕，組建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甘為漢奸。蔣維喬遊河北時與之面談無果，返滬後又專函規勸，“深望足下及早抽身，勿終於為賊也。”“因反對其人而倚假外力，顛倒祖國，此萬不可者也。”^⑬紡織實業家江上達曾擔任汪偽政府職務，抗戰勝利後被控為漢奸，亦是蔣維喬勸其自首，並陪同前往特工隊，協助籌措補救辦法，盡顯其堅守民族大義、是非分明的交際原則。

蔣維喬的社會聲望，自然引起了日偽方面的注意，對方多次以功名利祿為餌，誘其合作。儘管生活清貧困頓，蔣維喬卻始終嚴詞拒絕，不為所動。1938年，梁鴻志等人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意圖聘其出任教育次長一職。蔣維喬明確回應：“我一生愛惜羽毛，不肯苟且的”，明志之言，凜然可鑒。^⑭1942年，他在友人金某的宴席中遭遇偽政權職員遊說，勸其就任教育協會會長。蔣維喬默然離席，次日更告誡金某：“倘是偶不經意，與他們發生關係，那就插入的泥足，永遠拔不出了。”並稱“我七十老翁，還怕死麼？”^⑮此後，偽政府仍不死心，屢以中日合辦暑期講習所講師、上海特別市教育會副會長、編輯委員等頭銜糾纏不休。蔣維喬明知將招致陳公博、丁默村等人忌恨，卻仍不為所動，或另薦他人，或直接回絕，並謂：“我儘管貧窮，從來不飲一滴盜泉水。”^⑯汪精衛在上海宴邀各界人士，他撕毀請柬，堅拒出席。事後得知，汪精衛竟誤將震旦大學校長認作蔣維喬，恭敬迎候，並因其未到而推遲開宴。面對說客，他亦毫不留情。日華佛教會曾遣一名中國僧人前來遊說，請其蒞會演講，蔣維喬厲聲訓斥：“你們出家人，何苦自尋煩惱，和寇賊撕〔廝〕混。”^⑰姚明輝借私交之誼，請其為偽教育部駐滬辦事處填寫光華大學調查表，更被蔣維喬當面痛斥為“漢奸的走狗”^⑱，姚氏只得踉蹌遁去。日偽見拉攏不成，轉而施以武力威脅。蔣維喬內侄之子曾在蔣宅西廂房後設置秘密電台，與重慶方面保持聯絡。事泄之後，日偽特務封鎖蔣宅，禁止出入。然而蔣維喬

處變不驚，“仍讀書著述，練功舞劍不輟”^⑧，其風骨令人敬佩。屢次誘脅失敗後，日偽亦知其凜然不可侵犯，故自 1944 年之後，“我的門前很清潔，沒有歹人的蹤跡了。”^⑨

結語

隨著日本全面入侵，上海民眾家園被毀、生活朝不保夕，陷入對未來的憂懼迷茫之中。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乃至政府要人通過日記宣洩悲觀、焦躁、苦悶與不滿等負面情緒。受此影響，一些人的行為也趨於麻木、消極怠工甚至放縱享樂，無形中加劇了戰時社會的混亂與失序。蔣維喬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他在日記中以理性而克制的筆調客觀記述現實境遇，甚少直抒胸臆或作出主觀評判。儘管在旁人眼中，蔣維喬年屆古稀仍須操持贍家，誠可謂生活困頓，但他本人卻並無怨懟，依舊有條不紊、勤懇工作，致力於社會文教事業，並始終保持從容平和的心境。唯有在面對日偽政權的拉攏與威脅時，他才不假辭色，展現出鮮明的民族立場與毫不妥協的抗爭精神。這種從容與堅韌，既源於蔣維喬剛直率性的性格和豐富的人生閱歷，也與其常年修法靜坐、注重養生的生活習慣密切相關，映射出淪陷區民眾在逆境中安之若素、堅韌不拔的另一種生存樣態。

抗戰時期，上海的教育文化事業深陷困境，這一點在當時出版的報刊與留存的檔案文獻中均有明確反映。蔣維喬的日記則從更為具體而細微的層面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實態，尤其凸顯了經費短缺對當時高校辦學、書籍出版與圖書館運營所造成的多重制約。在充分認識到文教事業對於保存教育火種、延續文化命脈以及培養抗戰人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基礎上，蔣維喬並未將自己局限於普通教員的身份之中，而是毅然承擔起多所學校及文化機構的管理職責。面對日偽統治的威脅，他積極奔走，多方籌措經費，勉力維持各機構的正常運轉，並推動包括整理宗教典籍、促進佛教文化傳承與研究在內的一系列文化事業。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蔣維喬以其實際行動深刻踐行了“教育救國”的理念，為淪陷時期上海文教事業的存續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因而贏得了社會各界廣泛的尊敬與讚譽，堪稱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勇擔使命、以身報國的傑出代表。

①《中文版序》，漢斯·維爾納·格茨（Hans-Werner Goetz）：《歐洲中世紀生活》，王亞平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年，第 2 頁。

②筆者管見所及，有關蔣維喬生平和思想的整體性研究參見何宗旺《蔣維喬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關於蔣維喬的個人生活，學者們主要研究其 1903~1911 年的在滬日常、職業選擇、知識轉化、社會交往及旅遊愛好等，參見葉舟《“過渡時代”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蔣維喬在上海（1903~1911）》（上海：《史林》，2015 年第 1 期），陳仲丹《民國時期的大旅行家蔣維喬》（南京：《唯實》，2018 年第 5 期），徐文武《主動還是被動：從蔣維喬的即時觀察認識“學堂樂歌”的豐富性》（西安：《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9 年第 3 期），黃漫遠《清末書院生徒的職業選擇與職業經歷——以南菁

書院蔣維喬為例的考察》（長春：《職業技術教育》，2020 年第 21 期），張芝帥《晚清民國時期蔣維喬的社會交往與文化慣習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 年）；在蔣維喬的教育活動方面，學者們圍繞其教育思想、教材編輯、改革措施、職業教育、心理學實踐等開展研究，參見何宗旺《蔣維喬與中國近代教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3 年第 2 期），徐超富、何宗旺《蔣維喬與近代新式教材編輯思想初探》（湖南湘潭：《湘潭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閻書昌《蔣維喬的心理學實踐與中國近代心理學史研究》（江蘇常州：《常州工學院學報》，2008 年第 3 期），謝長法、王景玄《蔣維喬：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弄潮兒》（北京：《教育與職業》，2009 年第 13 期），王景玄《蔣維喬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付惠

雲《蔣維喬語文教科書編輯思想探微》(北京:《小學語文》,2015年第3期),曾玉嬌《蔣維喬與我國女子職業教育探微》(成都:《教育科學論壇》,2021年第15期);關於蔣維喬的養生方法和佛學研究,參見周霞《蔣維喬與佛學》(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3期),周佳榮《從宗教哲學到靜坐養生——蔣維喬的事功與著作》(香港:《大公報》,2016年8月22日),郭紅、楊玉娜《“過渡時代”下知識分子的養生選擇——以蔣維喬為中心》(太原:《武術研究》,2018年第7期),郭紅、楊玉娜《蔣維喬在滬的養生交往》(上海:《醫療社會史研究》,2022年第1期)。尚未有關於抗戰時期蔣維喬日常生活的專題研究。

③④⑤⑦蔣維喬:《靜坐氣功——因是子靜坐法彙編》,侯漢初注釋,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第35頁;第42頁;第52頁;第53頁。

⑥蔣維喬:《因是子健康養生經》,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0年,第83頁。

⑧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四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92頁;第2123頁;第2031頁;第2114頁;第2059頁;第2076頁;第2094頁。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五冊),第2579頁;第2559頁;第2590頁;第2376頁;第2437頁;第2439頁;第2399頁;第2638頁;第2338頁;第2299頁;第2431頁;第2213頁;第2620頁;第2266頁;第2360頁;第2532頁。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六冊),第2779頁;第2764頁;第2669頁;第2773頁;第2956頁;第2651頁;第2692頁;第2693頁;第2795頁;第2661頁;第2770頁;第2844頁;第2975頁;第3206頁;第2706頁;第2734頁;第2818頁;第2972頁;第3176頁;第3180頁;第2998頁;第2652頁;第2935頁;第2995頁;第3002頁;第2984頁;第3086~3087頁;第3153頁。

⑭陳櫻寧先生與因是子蔣竹莊先生討論先後天神水》,上海:《仙道月報》,1939年第2期。

⑯⑰蔣維喬:《蔣維喬自述》,濟南:泰山出版社,2022年,第11頁;第3頁。

⑰壽守型:《論所謂補血針》,南京:《國醫公報》,1934年第2卷第1期。

⑲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上海:《覺有情》,1943年第4卷第81~82期。

⑳王瑜孫:《小忍庵叢稿》,私印本,2012年,第304頁。

㉑㉒湯濤:《張壽鏞校長與光華大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7頁;第251頁。

㉓㉔顧國華編:《文壇雜憶》(全編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86頁。

㉕蔣維喬:《序言》,《愛國女學校校友會年刊(第一期)》,上海:中國印刷廠,1924年。

㉖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49頁。

㉗《不為經濟,不為家庭與戀愛,悲母校之前途黃冰清自殺》,上海:《時事新報》,1934年2月6日。

㉘《正風文學院舉行書畫會》,上海:《申報》,1938年12月16日。

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蔣維喬:《八年來敵偽誘脅記》,載政協江蘇省常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常州文史資料》(第五輯),1984年,第85頁;第91頁;第84頁;第87頁;第92頁;第90頁;第91頁;第92頁。

㉞《短評:戰區同學的生命線——貸金》,重慶:《戰時青年》,1940年第4期。

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七冊),第3232頁;第3242頁;第3250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沈延國:《回憶蔣竹莊先生》,載《常州文史資料》(第五輯),第106頁;第102頁;第107頁。

㊿《陝西宋版藏經運滬波折》,上海:《威音》,1931年第36期。

㊿葉恭綽著,王衛星整理:《葉恭綽全集》(第三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第1525頁。

㊿《祝沈信卿先生八秩壽辰 壽儀移充鴻英圖書館經費》,上海:《申報》,1943年5月3日。

作者簡介:邱宏霆,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博士。長沙 410000

[責任編輯 陳志雄]